

胡适撰

胡适

说

名家说——
“上古”学术萃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学变迁









家说
“上古”学术萃编

胡适撰

胡适

说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学变迁



名家说——“上古”学术萃编

胡适说文学变迁

胡适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625 插页 4 字数 184,000

1999年8月第1版 199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5325-2559-7

I·1305 定价: 13.20元

出版说明

这是继“蓬莱阁”丛书之后，本社推出的又一套设计新颖的学术精品丛书。

四十多年来，循着古代文化各领域研究的轨迹，我社不懈地以出版一流学术研究著作为宗旨，即使承担巨大的经济负荷也在所不惜，终于形成了以“中华学术丛书”为核心的上古社学术著作系列，并成为与“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比肩并峙的品牌图书而饮誉海内外，其价值绝不因年光流逝而减褪。常常地，我们接到各地读者的函电，询问这些精品图书有无再版的可能；也常常地，在书市上，我们见到有人淘拣到已经残损的一册半帙这类著作而喜悦不禁。于是，我们萌生了依据发展着的图书市场的需要，对我社这笔珍贵的累积以各种方式重版或重组的想法，这套丛书就是其中的一组。

考虑到当前青年学子的实际需要与承受能力，这套丛书择取影响尤著而为当今学术界读书界尤其急需的论题组合而成，或选自原来单行者，或节取文集之某一精粹部分，一书一题，说有专诣，人为名家，自成系列，故名之曰“名家说——‘上古’学术萃编”。

虽然，“名家说”的组合形式与“蓬莱阁”不同，然而在学术

源流上,却相承而又互补。如果说“蓬莱阁”着重收录清末民初以降国学宗师大家的开山之作,更多文化学术史的宏观建构;那末“名家说”,则多取三四十年代以来大师及名家们对某一专门领域或专题的潜心研究之作,更多由微观而见宏观,其所吸取的西学的成果,也随时代而有所不同。因此,即使二套丛书中作者有所重合,但品种的择取,仍以丛书各自的宗旨为别。于是由“蓬莱阁”而“名家说”,读者会产生由登堂而入室,探突而临佳境的感觉,其一以贯之的精神则是文史哲打通,中西学兼融的世纪性学术趋尚,以及那包含着严格的学术规范的鲜明的学术个性。因此建议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仅应汲取具体的专门知识,而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其中所内含的思维形态与治学门径。

与“蓬莱阁”丛书相同,本丛书每一种前都冠以一流专家学者的导读性文字,相信同样会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目 录

导言	耿云志 1
谈活文学	1
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	7
吾国文学三大病(节录)	11
寄陈独秀	12
文学改良刍议	15
〔附录一〕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26
〔附录二〕钱玄同《寄陈独秀》	30
寄陈独秀	35
〔附录〕陈独秀答书	38
历史的文学观念论	39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43
答朱经农书	60
〔附录〕朱经农原书	64
答任叔永书	68
〔附录〕任叔永原书	72
追答李濂镗君	76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79
〔附录〕日本译《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序	158
《中古文学概论》序	160
《白话文学史》自序	165
《白话文学史》引子	174
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	179
逼上梁山	
——文学革命的开始	184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	215
四十年来的文学革命	257



导 言

耿云志



现在凡受过教育、能识字读书的人，无论男女，无论老少，差不多都能开口讲话，提笔为文。而其所说的话，所写的文，别人也能听懂读懂。这个事实真是太平常了。然而在八十年前，这还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这个事实是怎样造成的呢？原来这是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的功劳。

提起文学革命，谁都不应该忘记胡适，他首先起来倡导，并始终是文学革命的中心人物。

胡适首倡文学革命，其最主要的根据就是“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所谓“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一言以蔽之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因袭古人，模仿古人，只能徒具形式而已，绝不足以表达今人的思想与情感。而文学贵在有思想，有情感。“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

有浓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矣”。（《文学改良刍议》）

胡适认为，文学革命的最根本的目标是造成“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所谓国语，即以北方的口语为基础，全国大部分地区皆通行，能为绝大多数国人所运用的白话。白话之能够取得国语的资格，因为它已存在了上千年，而且有许多成功的白话的文学作品，为全国人民所喜闻乐见。胡适指出，“白话之文学，自宋以来，虽见屏于古文家，而终一线相承，至今不绝”。（《历史的文学观念论》）“白话之文学种子已伏于唐人的小诗短词”，至宋而“语录体大盛，诗词亦多用白话者”（同上）元代之小说戏曲，更近于白话，明清小说，已可说是白话文学的典范了。所以，白话之成为国语，白话文学之成为国语的文学，实在是有其充分的历史的根据，并非突如其来，尤非少数人凭空提倡所能致。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这篇长文中，更具体论述了白话终于取代古文成为文学正宗的历史过程。

胡适指出，古文到了清朝道、咸时期，已现出没落的趋向，曾国藩在打太平天国后，政治上有中兴的抱负，在文学上也作了一番古文中兴的事业。但正如他政治上的中兴之梦归于破灭一样，他的古文中兴事业也失败了。曾氏以后，因为时势的趋迫，中国的文人学者不得不尝试一种应用的古文，例如严复、林纾利用古文译介西方的思想、文艺作品，梁启超、谭嗣同利用古文作维新思想的宣传，章炳麟利用古文撰述含有新观念新方法的学术著作，而章士钊等人则利用古文做新式的政论文章。这些人都是尝试把古文当作可以应用的工具。因为求其应用，所以力求做到通顺，使人明白。所以他们的古文同原来刻意雕琢的古文不同了。胡适说是“古文范围以内的革

新运动”。但他们的革新运动挽救不了古文没落的命运。这些人的弟子们,要么拘守师业,成了没有出息的末流;要么跳出古文巢臼,做了白话文的同道,钱玄同、周氏兄弟(周树人、周作人,他们在东京时也听过章太炎的讲学)便是。

如果说“应用的古文”还勉强能作通,勉强供给应用,那么用古文作文学,便已是难乎为继了。林纾的翻译小说,尚能勉强供一时的需要,而当周氏兄弟用古文翻译《域外小说集》时,便完全没有市场了。那时,社会上广泛流行的是明清以来的白话小说。

一方面是古文愈来愈不适于用,它的文学愈来愈没有市场。另一方面,由于近代交通的发达,愈来愈需要一种全国到处适用的统一的国语,而白话正好适合这种需要。白话文学愈来愈广泛地流行,成为普通人的精神必需品,这种时代背景为文学革命的展开准备了条件。

胡适指出,我国历史上已多次发生文学的变革,但以往的变革都不是自觉提倡的结果,而是缓慢的自然的变迁,这在时间上未免太浪费了。清末以来,白话在应用领域已有很大的发展,但人们不曾自觉到白话文学有取代古文文学的资格,只是为了向群众做宣传的需要,他们才不得不做些白话文,真要做“美术的文章”,他们还是用古文。所以,清末的白话文并不曾导致文学革命的发生。为了达到以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的目的,必须自觉地进行一场文学革命,即在自然进化的趋势之上,再加上有意识的革命,以促其实现。这就是胡适提倡文学革命的初衷和理由。文学的自然的变迁和进化是文学革命的历史的根据,而时代对白话国语的需要,对于白话文学的需要,则是文学革命发生的现实的理由。所以,在文学革命的开

篇之作——《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宣言道：“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的利器，可断言也。”

二

胡适在文学革命的探索中发现，文学上重大的变迁，差不多都是文学形式的变迁。他在1915年到1916年同他在美国的几位同学朋友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逐渐领悟到：“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学形式（工具）的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取代‘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逼上梁山》）他举例说，我国古代“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至于当下提倡以白话代替文言，亦正是文学革命之中心问题。他说：“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谈新诗》，《胡适文存》卷一第227页）他又说：“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做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放。”（《尝试集自序》，《胡适文存》卷一第279页）

因为认准文学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解决文学的语言与文体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要以白话代替文言成为新文学创作的

唯一利器,所以,胡适和他的同道者们能够全力以赴,集中目标,努力奋斗,只有短短几年时间,就取得了大胜利。

当时和后来一些完全不懂文学革命为何事的人,曾责备胡适只注重文学形式的改革。其实,文学革命之所以发生,胡适之所以大力提倡,就是因为看到旧的文言已不适应千千万万的人们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的需要,也不适应表现一个其生活内容比以前不知要复杂多少倍的新时代的需要。反对白话文最力的林纾曾叹道:“海内读吾译者,往往以不可猝解譬其艰深。不知原书之难且实过之。理本奥衍,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其实这正是古文不足以表现复杂深刻思想的自供状。

在胡适看来,文学革命的发生,就是因为旧有的文学形式不适应表现新时代文学内容的需要。文字形式是文学的工具,工具不适用了,就应当改换新的。就这一点说,文学革命与人类史上的一切革命都是一样的,都是新内容产生了,而旧形式束缚它的成长,新的内容冲击旧的形式,打破旧的形式,创造新的形式,这就是革命。

文学的新内容大多来源于民间社会,而新的文学形式往往也是首先产自民间。早在1916年,胡适尚未归国的时候,他在同梅光迪争论文学革命的问题时,就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历史上文学的大变迁往往都是,先在民间发生一种新的文学形式,经有眼光的文学家采集、加工,获得了提高,逐渐为上层文人所认可,一种新的文学形式随即产生。胡适极看重民间文学对于文学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文学史没有生气则已,稍有生气者皆自民间文学而来”。(《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由此,他认为中国新文学的内容问题,不可以悬空乱谈,

这是一个需要文学家在创作实践中加以解决的问题。他希望有志于建设中国新文学的人们,努力到民间社会去观察体验,开阔眼界,广集材料,再在此基础上,利用新的文学工具,采用新的创作方法,才可造出国语的新文学。

三

历史上文学的变迁、文学的进步,社会生活的发展和民间文学的活动是直接的推动力。但不仅如此,外来文学的影响也是一种助推的力量。古代的中国文学曾广受周边国家和周边民族文学的影响。佛教的传入即曾大大影响了中国文学。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曾郑重讨论汉唐时代佛教翻译文学。他指出,两晋南北朝的文学,追求骈偶,说理不能明白,记事不能清楚,写景表情就更不能自然了。由于佛教大规模传入,佛经的大量翻译,使原有流行的文体招架不住了。胡适说:“这样伟大的翻译工作自然不是少数滥调文人所能包办的,也不是那含糊不正确的骈偶文所能对付的。结果便是给中国文学史上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新材料与新意境是不用说明的。何以有新文体的必要呢?第一,因为外国来的新材料装不到那对仗骈偶的滥调里去。第二,因为主译的都是外国人,不曾中骈偶滥调的毒;第三,因为最初助译的很多是民间的信徒;后来虽有文人学士奉饬润文,他们的能力有限,故他们的恶影响也有限。第四,因为宗教的经典重在传真,重在正确,而不重在辞藻文采;重在读者易解,而不重在古雅。故译经大师多以‘不加文饰,令易晓,不失本义’相勉。到了鸠摩罗什以后,译经的文体大定,风气已大开,

那班滥调的文人学士更无可如何了。”(《白话文学史》第158—159页)这一大长段话,说明佛教的传入,佛经的大量翻译和广泛传播,大大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变迁。照胡适的看法,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翻译佛教的大师们“用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来翻译佛经,但求易晓,不加藻饰,遂造成一种文学新体”。由此抬高了白话文学的地位。(二)“佛经的文学最富于想象力,……对于那最缺乏想象力的中国文学确有很大的解放作用。”“中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是印度的文学的影响的产儿。”(三)印度文学注重形式的布局与结构,对中国文学也有影响。例如,“佛教的散文与偈体夹杂并用”的方法,就对中国的弹词产生影响。(见《白话文学史》第202—203页)可以说,佛教文学的输入对中国文学发生的影响是外来文学发生作用的一个实例。至于从清末到民国年间,西方文学的输入,对中国现代文学所发生的影响那就更加醒目了。文学革命初起时,胡适与陈独秀即很强调介绍外来文学的重要。1916年2月,胡适致信陈独秀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文学名著入手,使中国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寄陈独秀》,载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第69页)胡适以身作则,先后翻译了法国、英国、美国、俄国等国著名作家的短篇小说17篇,介绍给国内。后来又做一次《论短篇小说》的讲演,着重介绍了短篇小说的创作方法。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这篇被誉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一文中,也有很大的篇幅介绍西方写实主义文学家们的创作方法。中国新文学的一些大家们,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受过西方文学的熏陶。令我们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的凑合,似乎至今还没有人对这一段